



# 《格萨尔》史诗文本 传承的互文性解读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5)02-0154-07

● 王治国

**摘要:**《格萨尔》史诗经千年传唱流传至今,文本传承是一条重要的传播渠道。说唱艺人、唱本记录者、僧侣文人作者和听众群体都参与了史诗文本化的过程,构成了史诗传播的多重主体。文章借鉴互文性理论,在对《格萨尔》文本迁移与当代重构的寻绎中,审视《格萨尔》文本生成机制的多重视域,力图构建史诗从古老传说到现代演绎中互文传承的意义空间。

**关键词:**《格萨尔》;文本生成;异文本;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I057

**文献标志码:**A

## 一、引言

**“活形态”**藏族史诗《格萨尔》是民间口头文学巨著,其流传经历了由口头说唱到底本(原始的说唱记录本),到手抄本(被整理加工了的记录本),再到木刻本(较为规范的成型本)和当代的印刷本的多元文本型态。口头说唱是底本、手抄本、木刻本的基础,有了记录文本后,口头说唱依然存在,说唱艺人得到了新的本子后,还可能增加新的说唱部本。有些木刻本

**[基金项目]** 本论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活形态民族史诗《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2YJC74010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4M551031)的阶段性成果。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5年第2期(总第85期)

2015.No.2(Total No.85)

被再度转抄,以至成为了以刻本为原文的新的手抄本,从而形成了更多新的部本。我们在计算《格萨尔》的部数、诗行和字数时,一个分部本,不管有多少种异文本,都只算作一本。不同地区传唱着不同内容的分部本,不过故事的基本内容大同小异,变化不大,而且后续的分部本各有千秋。如果把各种异文本分开计算,《格萨尔》的篇幅就更为浩瀚。事实上,史诗篇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再加上新的说唱艺人不断报出新的部本,最终数目无法确定。就《格萨尔》文本传承而言,从格萨尔王核心故事原型蓝本或是源本开始,经由民间艺人的摹本说唱和文人僧侣的仿本创作,形成史诗众多的分章本和分部本。对这些文本以及大量异文本的产生机制和流传方式进行考察,对蓝本与摹本或是源本与仿本之间文本改造与转换关系作研究,构成“格萨尔学”版本研究和文本传承研究的主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的必要性。本文借助“互文性”理论对《格萨尔》的异文现象和文本传承展开研究,以期构建史诗从古老传说到现代演绎中互文传承的意义空间。

## 二、《格萨尔》传承的文本形态

一般而言,口头文学经过文本化过程之后,会以写本、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现代印刷本、改编本、校勘本、口述记录本、录音整理本、视频和音频等形式相继存在,以便于读者更好地赏析和专家们的学术研究。口头文学的文本化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史诗也是如此。《格萨尔》史诗还存在着分章本和分部本的类型,这是它与其他史诗相比的独特之处。格学界最早提出分章本与分部本两分法的是翻译家王沂暖先生(1907~1998)。早在1979年《民间文学》第二期上刊登的文章《〈格萨尔王传〉简介》中,他就将史诗文本分成两种类型:分章本和分部本。现将该文要点引述如下:

《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史诗,据我们初步了解,藏文原文有两种本子,一种可以把它叫做“分章本”,一种可以叫做“分部本”。分章本,是把格萨尔王一生的事迹,写在一本里,分为若干章。这种分章本,可能是最初的著作,或者说是较原始的本子。……我们所说的分部本与分章本不同处,在于它首尾完整,独立成为一部,主人公都是格萨尔王,为全部《格萨尔王传》中的一部。<sup>①</sup>

所谓“分章本”,就是把格萨尔一生的业绩分为若干章,集中写在一部书里。《格萨尔》最原始的本子就是分章本,也是艺人说唱最早的底本。大多数手抄记录本和木刻本都是简述故事,多为分章本,如《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拉达克分章本以及一些蒙文本《格斯尔可汗传》。格萨尔诞生、赛马称王,降妖伏魔、身经百战完成人间使命后闯入地狱救母,安定三界,最终重返天国,这成为贯穿史诗的基本线索,也是各个分章本的主要故事情节。所谓“分部本”(藏语叫“宗”),可以细分为多种情况。一种是把分章本中的一个情节、一个故事,扩充成首尾完整的独立的一部,比如:把分章本中的格萨尔诞生,扩充为《英雄诞生》部、《格萨尔诞

<sup>①</sup> 王沂暖.《格萨尔王传》简介[J].民间文学,1979,(2).转引自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Z](第一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生史》部或《降生品》部；把格萨尔与珠牡结婚，扩充为《迎娶珠牡》部；把格萨尔称王，扩充为《赛马称王》部；把降伏北方妖魔，扩充为《降妖伏魔》部；把霍尔入侵与降伏霍尔，扩充为《霍岭大战》部等等。这些分部本就是由分章本中的情节扩展而来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分章本的内容之外，另讲新的故事，独立成篇，如《卡切玉宗》、《大食财国》部等，这样的分部本多到几十部，乃至上百部。还有一种情况是从分部本中又派生出新的分部本，大故事套小故事，从大部分离出小部。但是所有分部本的中心人物都是格萨尔，它们都是《格萨尔》的一个组成部分，汇总起来，就构成了宏伟的英雄史诗《格萨尔》。

正如《格萨尔》形成过程的复杂程度一样，《格萨尔》文本的存在形态也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因为，《格萨尔》文本不仅可以按照上述两分法分类，而且在传承中产生了大量的异文，当然这也是活形态史诗本身的特点。由于史诗自身存在的口头性和流变性等特点，伴随着《格萨尔》在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流传，再加上几乎每一位民间艺人的每一次说唱都是即兴演说，每次演述都会产生一定幅度的变化或是创造，形成一个个互有差异、相对独立的说唱本。这些本子尽管形态各异，但他们又是同一作品的不同变体(variants)，这些变体我们称之为“异文本”。本人者曾撰文指出：

正如伟大作品一次次的翻译，构成了不同的译本，而不同的译本在本质上也是作品的异文本，只不过是语言载体改变而已。这些异文本的存在，既说明了活态史诗具有流动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又说明了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众人参与创作与传播一体化的基本性质。<sup>①</sup>

这些异文本的存在，构成了活态史诗传承的另类形态，也是史诗研究中需要重新解读的一个话题。尽管在格学专家作数据统计时，异文本往往被当作变体，不单独占据统计数额，但是异文本的形成以及流传，在发生学意义上已经构新的研究课题。这就需要我们拓宽理论视角，对史诗文本传承作出合理解析。

### 三、史诗文本生成的互文性阐发

实际上，就《格萨尔》文本传承、变异的复杂形态而言，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框架，能够为我们提供强有力的阐述空间。互文性理论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法国文学理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提出，后经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里法泰尔 (Michael Riffaterre)、热奈特 (Gerard Genette)、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等众多文论家不断丰富、发展而成为一个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批评的重要概念。克里斯蒂娃受俄国学者巴赫金 (Bakhtin) “复调小说”的启发，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sup>②</sup>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一的文本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其意义是

① 王治国.《格萨尔》“本事”与异文本传承[J]. 西藏大学学报, 2013,(1):174.

②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在参照其他文本的互动过程中生成的。

如果说克里斯蒂娃是将互文性归结为起源和影响的话,那么巴特和里法泰尔则将互文性扩展到文本的阅读和读者的记忆层面。在里法泰尔看来,“读者对作品的延续构成了互文性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它是读者的记忆,是无时序性的”。<sup>①</sup>这使互文性一下子从由文本到作者,又转向了读者层面,把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大大推进了一步。热奈特则更进一步,将互文性分为互文性(intertextual)和超文性(hypertextual)。前者是指“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即是两篇文本的共存关系;后者指“一篇文本从另一篇已然存在的文本中派生出来的关系”,即是一篇文本的派生关系(模仿或戏拟)。随后他又把超文本分成了五种类型。<sup>②</sup>显然,热奈特把互文性从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文学创作的概念。文学来自模仿和转换,不仅仅是来自文学自身,而且来自文学之外的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

由于互文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国内学者纷纷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并给出了各自的界定,比如秦海鹰作了如下界定:

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明引、暗引、拼帖、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套用等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其他文本可以是前人的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sup>③</sup>

这个定义简洁、易懂,基本上吻合当时比较认可的主流观点。然而,互文性理论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新概念,现在仍在不断发展,所涉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从本质上来说,互文性理论概括和解释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将文本之间的互涉、互动看作是文学的构成要素,强调在文际关系中发掘和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从多角度思考文际关系的建立方式和运作机制。这样看来,互文性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许多重大的文学问题将会获得新的阐释空间,比如说,文学的来源及其影响问题、文学的母题与变异问题、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关系问题、文学史研究模式问题、文学与文化和历史互动关系问题等。事实上,互文性理论涉及的层面十分广阔,已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中最具吸引力的课题之一,王宏印对此作过详尽评价:

所谓互文性的观点,就是企图切断文学和社会文化及个人生活的联系,而是集中关注文学史本身的前后继承关系,即一文本和其他许多在它之前和之后的文本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在一个文学文本中或隐或显地存在若干其他(文学的或非文学的)文本的问题。这样看来,互文性可以从作者创作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读者阅读的角度

① [法]萨莫瓦约,邵伟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4.35.

② 同上,页19。

③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29.

度来看,前者主要涉及文学的渊源和创作资源的利用问题,后者则涉及文学接受中的阅读理解和阐释效果问题。就创作而言,互文性包含了某一文学作品对于其他文本的引用、参考、暗示、抄袭等关系,以及所谓超文本的戏拟和仿作等手法。进一步而言,互文关系包含了对于特定意识形态即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回忆,以及对于文本作为素材所进行的改变与转换方式。<sup>①</sup>

从这一角度观察文学史,我们会发现某些文类相对来说尤其具有互文性,比如说史诗。首先,传统的口述神话、口头故事和民间智慧构成了史诗产生的时空背景。那个时候,“个性”和“作者”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中尚不明显,可以说,文学是由群体之间相互传唱而成的。其次,史诗以集体素材、原始神话和民族智慧为蓝本,表现和阐述的是不变的道理。因为史诗是一种文学传递,同时也正因为它需要重复,需要把同样的本事改编给不同的人群,这样,活形态史诗就得以传承千年,并继续流传。当然,这期间不但体现了众多文本(口头和书面)的前后继承互文关系,而且体现着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回忆,这都形成了史诗互文性传承的重要维度。

#### 四、《格萨尔》文本传承的互文性视域

如果说异文本为我们了解《格萨尔》文本创作渊源和资源利用提供了发生学意义上的解读,那么,互文性理论将会更加全面地解说史诗主体之间的互文关系,即说唱艺人(即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创作主体和听众(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主体,乃至史诗文本本身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因为,互文性理论内在地涵盖了文本间性或主体间性的问题。除了说唱艺人的口耳相传外,在众多分部本和异文本的文本化过程中,文人作者(僧侣文人、手抄本记录者等)和听众群体(普遍意义上的读者)都参与了史诗的传承,构成了复杂的互文主体关系。互文性理论为我们研究大量文本的产生,特别是分部本和异文本之间的关系,各个文本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其相互交织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为重新审视《格萨尔》文本的生成和传承机制提供了多重视域。

第一,互文性是一种史诗的创作手法或是策略。说唱艺人在创作或是演述一个部本之前,已经听过或至少是梦到过许多有关格萨尔的故事、传说,看到过种种抄本或刻本。艺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对以前的故事本子进行吸收、借鉴和改造,通过恰当的互文手段,进行符合现场语境下听众兴趣和口味的表演,从而产生了新的说唱本子。而这些新的部本在下一次同一个艺人或不同艺人的演述中会又一次被引用、借鉴,从而体现出说唱艺人(作者)创作的互文特点,构成更广的互文语境。

第二,互文性还是一种听众欣赏(阅读)经验。听众的观看(或是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互文性的欣赏(或是阅读)。欣赏一次表演,听众首先就要指向他先前的赏析经历,他们对《格萨尔》的故事情节和说唱曲调都怀着自己的期待,当欣赏到艺人们的演唱时,会激发先前的互文背景,产生与当下演说的共鸣,带来审美的享受,从而满足听众的视域融合(horizontal fu-

<sup>①</sup> 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第二版)[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203.

sion)。而这些新的审美享受又会在下一次的演说活动中,成为听众参与的互文期待。他们企盼着欣赏到既有传统韵味又有个性特征的《格萨尔》演说场景,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听众的期待也激发着说唱艺人不断创作、演说新的部本。

第三,互文性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在史诗传承过程中,互文性生成机制使《格萨尔》产生新的内容、更多的分部本和异文本,同时也使史诗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和集体记忆的传承。如此多的部本或文本的总和,涵盖的是对藏族文学记忆活动的深入审视。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中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分析,把互文性看成记忆:

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文学还可以汇总典籍,表现它对自己的想象。当我们把互文性当成是对文学的记忆时,我们提议把文学创作和释义紧密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发现和理解作品从何而来,同时也不要忘了考虑载录记忆的种种具体方式。<sup>①</sup>

第四,互文性不仅仅使被看成是简单的引用、借用和对他人的吸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技巧,而且是一种特定的文学特点,文学成为了人们共享的记忆和共有的遗产。也就是说,互文手法告诉我们一个时代、一群人、一个作者如何记取在他们之前产生或与他们同时存在的作品,同时也体现了这种记忆有多么重要,对推动文学史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何等重要。互文性使那些因为被复述、追忆或复写而激起我们集体记忆的文本,源源不断地进入新一轮意义的循环。萨莫瓦约继续指出:“对文学的记忆是从三个层次上起作用的,而这三个层次永远不会完全地重合:由文本所承载的记忆,作者的记忆和读者的记忆。因此而发生变化的文学创作——从记忆的不同方式,到不同的诠释——可以把互文性的两个基本的组成和联系部分结合起来:变换(la transformation)和联系(la relation)。”<sup>②</sup>正是置换变形的互文机制,使史诗《格萨尔》拉近了现代文明与远古传统之间的距离,承载着不同时代藏族人民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格萨尔》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不是简单的故事的累加与改编,而是被赋予了不同时代藏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感。大致来看,变换导致异文本的产生,联系则是分部本的必然属性,从而异文本和分部本的产生就能够得到进一步合理的解释。

第五,作为文学记忆的方法,史诗的互文传承演绎着藏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空间。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信息背景下的艺人,一方面承袭古老的传统和原始文化记忆,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加进现代社会的文化信息,使史诗沿着历史记忆的脉络,拥有了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文化成分。从《格萨尔》诞生之时起,史诗就和集体记忆双重地联系在一起。史诗被口头吟诵,程式和曲调的组合是为了史诗长时间在艺人脑海中留存。史诗内容本身也是为着记忆的需要:艺人们要捕捉基本的情节,搜罗和记忆史诗的母题。几乎在记载艺人和听众记忆的同时,史诗也记下了它自己的记忆活动,存放在记忆的丰碑里。尽管有时候说唱艺人试图挣脱那条联系着先前史诗的纽带,争取彻底的超越或尽可能多的个性,或都声

① [法]萨莫瓦约,邵伟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5.

② 同上,页134.

称自己的说唱部数是最全的,内容是最真实的,情节是最动人的,但史诗本身仍旧是作为集体的记忆而流传至今的。史诗的记忆仍然是厚重的,而且流入每个人的记忆,包括说唱艺人和听众,但它的层层积累永远为新的部本作着铺垫。

史诗的口头说唱和书面文本,把艺人(作者)和听者(读者)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翔实记载了每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所以,人们传唱史诗,实际上是在重现和延续过去的记忆、美好和伟大。万建中在谈到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时曾说:

……说到底,民间故事是一个故事对另一个故事的模仿,其本质在于它的文本性;是一种话语文本对另一话语文本的模仿,是对模仿对象的重复和变异。模仿和被模仿之间既同又异,它们有先后之别,却无高下之分,构成了一种平等的位移(dislocation)关系。<sup>①</sup>

史诗更是如此。史诗的记忆留存在自身的丰碑里——千年来的艺人说唱和文本化过程中。说唱艺人所凭借的是前人的成就、往日的影响以及自己的记忆,听众的记忆取决于共有文化记忆和他对以前演唱情景的回忆,而说唱艺人和听众的记忆又统一于史诗的集体记忆之中,因为艺人的说唱和听众的参与是史诗流传至今的两个必要因素。这样,史诗、艺人与听众所构筑的互文性记忆空间便又形成了更为广阔的互文——宏大的活形态史诗表演场景的再现和改编。

## 五、结语

史诗文本互文性生产机制的形成,其结果之一便是越来越多的分部本和异文本的发现和流传。不难发现,史诗的互文性,既包含着史诗的渊源和创作问题,又涉及史诗传承中听众的接受和效果问题,也包含着整个族群的深层心理记忆。也就是说,无论是从说唱艺人和文人作者的创作视角而言,还是从作为读者的广大听众的接受角度而言,《格萨尔》史诗传承中互文性发挥着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作用。事实上,在史诗从活态到固态、从民间传说到作家创作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均发生着密切的互文性关联。这样一来,另一个话题随之产生,即如何能够把这些极具互文性的宏大叙事结构在异域他邦得以再现抑或改编。这便构成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即史诗的翻译和域外传播问题。这也是需要文学界和翻译界有识之士共同讨论、通力合作的新课题。

[收稿日期]2013-08-09

[作者简介]王治国(1975~),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SU)东亚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2014~2015)。邮箱:wzgjack@sina.com。天津 300387

<sup>①</sup>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1.

周锦章·当代社会学的自杀学研究 ——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社会学家张杰为个案

责无旁贷地将美国的先进研究方法引入国内,努力促进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尤其是近年来不断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和参加学术会议,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问题积极献言献策。在影响颇广的《作为科学思考的社会学》一文中,张杰教授针对国内社会学界定量研究能力相对欠缺,一些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局限于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方法等问题,呼吁中国的社会学家不仅要侧重于对事物现象如数量、规模、程度等特征的描述统计,还要应用数量形式对变量相互依存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分析,进而通过回归分析讨论变量的因果关系,最后达致理论建树的最高境界。他认为:“科学社会学的功能和职责,是通过严谨的定量研究对经验事实现象进行描述、分析,探索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因果关系与规律性,激发思考的活力,强化理论的想象力,为理论的构建积累实际素材或提供更为直接的现实基础。”<sup>①</sup>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和世界地位与日俱增的同时,国家治理也碰到前所未有的难题。面对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上,张杰教授结合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实践土壤,强调:为了少走弯路,国家治理毫无疑问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文明和经验,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对国外的做法和经验甄别研究、合理取舍,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他分析道:当务之急,国家首先要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其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最后应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sup>②</sup>

张杰教授以中国学研究中心为阵地,推动美国大学、城市及社区对中国社会、文化、语言及思想的研究与教学。每年他都亲力亲为举办“布法罗学院中国周”活动,力图将跨文化交流融入大学学术生活的主流。他还常年在学校开设“当代中国研究”课程,与美国的大学生共同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张杰教授凭借他在学术项目管理、活动策划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技巧,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无偿地奉献给了促进中美两国教育、艺术、商业和医学领域相关人员的知识和技术交流的事业,体现了旅美学人的学术风范。

[收稿日期]2015-03-12

[作者简介]周锦章,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 100037

## On The Transmission of Epic Ges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Wang Zhiguo

**Abstract:** Sung texts by folk artists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mission of Epic Gesar for centuries. Many agents like folk artists, text recorders, educated monks and audiences a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extualization of Gesar, constituting a group of interconnected subject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Gesa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text transference, the present paper re-examines the multiple visions of Gesar text reconstruction and opens a new horizon of contemporary transference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of this ancient legend based on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pic heritage.

**Key words:** Gesar; textuality; variants; intertextuality (see P.154)

① 张杰.作为科学思考的社会学[J].河北学刊,2009,(3).

② 张杰.对西方治理体系应合理扬弃[J].人民论坛,2014,(S1).